

# “救世军”与战时上海难民救济

——以《申报》为中心的一个考察

徐 畅<sup>1</sup>, 郭毅敏<sup>2</sup>

(1.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山东 济南 250100; 2.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山东 济南 250100)

“救世军”并不是军队, 而是一个具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国际公益慈善组织。以“救世军”为名, 既宣示以“基督”名义开展慈善活动的宗旨, 又表明其军事化的组织架构和行政方针。“救世军”将宗教信仰与慈善活动紧密结合, 在近代以来战时救济、弱势群体保护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现阶段国内关于“救世军”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救世军”早期活动层面, 相比之下, 对其抗战时期在华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关注甚少。<sup>①</sup>本文旨在梳理“救世军”上海救济难民史实, 分析战时中国普通民众及各方势力与“救世军”互动的多重原因。

## 1 舆论视角下“救世军”在华的主要救济活动

由于“救世军”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 故活动范围随英美传教士布道而逐步扩展。中国关于“救世军”报道, 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期。1905 年 8 月, 《大公报》转引路透社消息, 报道了“救世军”布士将军的设想: “希望当年秋天能够在日本举行耶稣救世军大运动会”。关于这一设想的目的, 布士并不隐晦, 指出意在“先基督教化日本, 而后藉日本之力, 以教化亚细亚全洲”<sup>②</sup>。在日本站稳脚跟后, 英国陆军大臣随即提出“英国救世军即当在韩国起首先办理, 而在中国尤其应预先筹办”<sup>③</sup>。此后, 随着“救世军”与中国联系日益紧密, 国内关注度逐渐增加。通过“救世军”在亚洲扩展的历史, 不难看出其扩张的动力, 一方面来自本身的基督教信仰, 另一方面又受其背后政治力量推动。正是因为“救世军”宗教信仰与政治力量高度重合, 才使得二

者均对其在华的救济活动产生深刻影响。

### 1.1 营救与安置战时难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 “救世军”积极开展多项救济活动, 首要的是收容无家可归的难民。“八·一三事变”爆发后, 为躲避日军狂轰滥炸和凶残杀戮, 数万难民涌入租界, “救世军”在协助难民避难转移至租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并未携有食物, 所挟衣物甚少”的 5 000 个难民, “救世军”每日“下午六时卅分之前至少将供应热食一份, 另备巨量米饭, 送往白利南路, 供食在该处过夜之难民”<sup>④</sup>。同时, “救世军”还与国际红十字救济委员会、上海慈幼会等其他慈善机构密切合作, 通过多种方式, 收容、救济、安置难民。

1937 年 11 月, 国际红十字救济委员会与中日当局谈判, 确定在上海南市设立安全区, 开展战时人道主义救助活动。同为国际性慈善组织的“救世军”与红十字救济委员会密切协作, “营救难民一万二千名, 引入租界, 早晚发给米饭馒头”<sup>⑤</sup>。在保障难民日常饮食供应的基础上, “救世军”还协助难民转移到相关收容机构, 妥善安置。对于转入租界的 12 000 名难民, 除将“四千余人送海格路收容所, 二千分送至一二三收容所外, 其余六千余名至小沙渡第四收容所”<sup>⑥</sup>。

“救世军”还承担了部分难民收容机构的管理工作。1937 年 11 月, 工部局将其管理的交通大学难民收容所交“救世军”管理。“救世军”接管后, 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措施。尤其是积极与红十字救济委员会协调, 得到海外侨胞捐助衣物 30 万件, 平均每人

① 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茹:《救世军》,《国际资料信息》2003 年第 4 期;陈粒:《救世军:没有枪炮的军队》,《创造》2007 年 9 月;刘选国:《从救世军的演变看公益组织如何创新》,《新华每日电讯》2014 年 1 月;吕淑湘:《赫胥黎与救世军》,《读书》1989 年 5 月。

② 《路透要电照登》,《大公报》(天津版)1902 年 8 月 9 日,第 2 版。

③ 《路透要电照登》,《大公报》(天津版)1902 年 8 月 9 日,第 2 版。

④ 《惨无人道,敌扫射我难民》,《申报》(上海版)1937 年 10 月 29 日,第 5 版。

⑤ 《国际红十字难民救济委员会促成南市安全区》,《申报》(上海版)1937 年 11 月 7 日,第 6 版。

⑥ 《国际红十字难民救济委员会促成南市安全区》,《申报》(上海版)1937 年 11 月 7 日,第 6 版。

可得5件,有效解决了难民过冬问题。<sup>⑦</sup>

## 1.2 募集与捐助物资

开展形式多样的善款与物资募捐活动,是“救世军”在抗战时期在华救济活动的又一重要内容。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世军”在华进行了一系列募捐活动。1938年4月,“救世军”在香港举行募捐活动。《申报》评价道:“在此国际风云紧急,商业凋敝之时,该军不断努力,从事救济与鼓励之工作,中日战事爆发后,救世军对于难民之救济曾有不少之功绩。”<sup>⑧</sup>此次募捐活动得到香港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香港华人兵灾筹赈会捐款1000元作为“救世军”在港的工作经费,中国红十字会驻港办事处捐赠30箱牛奶。《申报》还特意提醒:“如有捐助者,可交九龙界限街二号,救世军本部,或香港文咸街南华西报代收。”<sup>⑨</sup>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救世军”募捐活动日益增多,社会各界的捐赠热情也日渐高涨。1939年2月,“救世军”在上海开展募捐活动,五天内募集善款18522元,而社会各界“仍有继续不断之捐助”<sup>⑩</sup>。此次募捐活动共募集善款4万元,善款主要用于“维持四万三千之难民”<sup>⑪</sup>。自1939年至抗战结束,“救世军”通过年度募捐活动,筹措救济难民经费,总额达到数十万元。随着社会各界捐助热情日趋踊跃,募捐数额持续增加,例如1939年4万元,1941年达17万元。

收容与募捐,是“救世军”两个紧密联系的救济活动,各自发挥独特的作用。“救世军”广泛设立的收容机构,不仅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提供了避难之地,还通过设立内部的学校、医院,为儿童和伤员提供特殊教育与紧急救护。募捐活动所募善款与物资,不仅为收容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加强了对原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力度,缓解了社会不安因素,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作用。《申报》曾以《救世军是贫民的救星》为题,大篇幅报道其在沪救济活动,并对“救世军”在沪负责人马瑞山中佐等人称赞道:“他们努力工作的结果,和许多艰巨工作的

成绩,已经把这种工作很顺利地开展。”<sup>⑫</sup>普通民众踊跃参加“救世军”各项募捐活动,以实际行动,表达对其善举的支持。一位捐款者这样道出了自己捐款的动机:“深悉救世军工作之伟巨,对沪上不幸华人及外侨援助甚多,故个人慨捐万元。”<sup>⑬</sup>

## 2 “救世军”与租界当局的战时合作

抗战时期,“救世军”之所以能够在上海开展救济活动,与其同租界当局合作密不可分。

### 2.1 双方在难民收容与安置上的合作

首先,协助难民转入租界。淞沪抗战爆发后,大量在沪难民逃入租界避难。仅“沪西铁路以外,难民聚集至四五万人,纷纷欲入租界”<sup>⑭</sup>。在此情况下,“救世军”与工部局首先要确保战时难民的安全转移。在获得工部局同意后,“救世军”派军长马瑞山、副军长马克礼协助难民救济,利用工部局的四辆卡车,将一万多难民转移出交战区。“救世军”还利用自己非政府组织的特殊地位,在救援活动中发挥独特作用。工部局车辆不能驶入华界,当“华租两界交通阻碍,几至无法送人”之时,全赖“救世军军长惠司脱援助,向英军接洽,临时放行给养车辆,并由工部局探长汉特发给给养车证照,由该会按日派车前往发给,方便难民生命得以维持”<sup>⑮</sup>。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救世军”与工部局的密切协调与配合,才使得难民转移与救济得以顺利有序开展。对此,《申报》评论说:“此次工部局当局,及英军及西侨方面之倾心援助,同胞数万得以救济,此诚最可以感激之一事。”<sup>⑯</sup>

其次,开展难童教育救济。“救世军”除满足营中难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外,还兴办学校,使营中的青少年在战时仍然能够接受教育。这一举措得到了包括租界当局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广泛关注。《申报》在报道难民营中所举行的难童识字学校开学典礼时说:“五万难民,三千子弟,一堂

⑦ 《交大难民交由救世军管理》,《申报》(上海版)1937年11月22日,第6版。

⑧ 《救世军举行周年募捐定四日开始》,《申报》(香港版)1938年4月2日,第4版。

⑨ 《救世军举行周年募捐定四日开始》,《申报》(香港版)1938年4月2日,第4版。

⑩ 《难民救济会核准一日救济,废历一月五日举行》,《申报》(上海版)1939年2月9日,第10版。

⑪ 《难民救济会核准一日救济,废历一月五日举行》,《申报》(上海版)1939年2月9日,第10版。

⑫ 《救世军是贫民的救星》,《申报》(上海版)1940年3月4日,第8版。

⑬ 《救世军招待各界发起募捐运动》,《申报》(上海版)1940年2月2日,第9版。

⑭ 《沪西难民救济经过》,《申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6版。

⑮ 《沪西难民救济经过》,《申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6版。

⑯ 《沪西难民救济经过》,《申报》(上海版)1937年11月1日,第6版。

济济, 盛况空前”<sup>⑦</sup>。与此同时, “救世军”还通过创办儿童职业补习学校, 为流浪童丐提供收容及学习的场所。

## 2.2 工部局对“救世军”的经济资助

为解决开展救济活动所需要的资金问题, “救世军”发起社会募捐, 募集所需善款及物资, 其间工部局通过多种途径, 对“救世军”的经济资助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 支持“救世军”募集难民基金。为解决上海难民问题, 上海慈善机构共募集善款 100 万元作为基金, 用于建设难民安置房屋。1939 年冬天, 上海难民救济工作形势严峻, 工部局华董虞洽卿与袁履登分别出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主席和秘书长, 与“救世军”密切合作, 积极开展救济工作。工部局鉴于“天气寒冷, 路上冻尸累累”, 决定“提出国币一千元, 补助救世军冬振经费, 以便煮备米粥, 分施于街头饥群”, 以此“保全多数贫民生命”<sup>⑧</sup>。

其次, 提供固定补助款。工部局年度预算中给予“救世军”固定补助, 以 1941 年为例, 是年发给救世军 5 000 元<sup>⑨</sup>, 成为“救世军”资金重要来源。

## 2.3 双方战时合作的现实考量

淞沪抗战前后, 由于国民政府迅速撤离, 作为租界管理机构的工部局, 实际上承担了战时在沪难民的救济与管理工作, “救世军”在此期间与工部局配合, 开展难民救济。“救世军”与租界当局之所以能够良性互动, 首先得益于其难民救济成为稳定租界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这一事实。租界当局支持“救世军”的救济活动, 不仅能够为其赢得民众特别是租界内中国民众的好感, 而且借助带有宗教色彩的“救世军”的宣传与救济活动, 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租界内的不稳定因素, 稳定社会秩序。正如“救世军”在法租界举办的罪犯假释活动时所说: 期望罪犯“改过自新, 奋发向上, 若仍怙恶不悛, 则下次被捕后, 未满足刑, 仍须照常”<sup>⑩</sup>。

其次, “救世军”本身所具基督教色彩, 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基督教在英美等国的巨大

影响力, 包括部分租界管理人员在内的大量在华基督教徒, 积极参与到“救世军”的慈善活动, 双方在宗教信仰上的相通性成为工部局对“救世军”在沪开展难民救济活动提供支持与协助的又一重要因素。

## 3 “救世军”与英美官方的战时互动

深入观察战时在华活动, 可以明显看出“救世军”实际上得到了英美官方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

### 3.1 英美官方对于“救世军”在华活动的有限介入

1938 年 5 月, 在“救世军”中供职的美国职员旦普斯特在通州被暗杀身亡, 美国政府立即向日本占领当局抗议, 要求尽快缉拿并严惩凶手。日本方面迅速通知美方: “严令通州县长即日将凶手捕获, 并惩办与此案相关之其他负责人。”<sup>⑪</sup>一名公益慈善组织成员身亡, 引起美国政府如此强烈的反映, 美日双方对此事件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值得玩味。

抗战期间, “救世军”一直被日方指间谍组织, 不仅对其中日籍人员以“籍信仰为掩护, 损害国家思想者, 不得不采取严峻之行动以对付之”<sup>⑫</sup>为由加以逮捕, 而且驻守北平的日本宪兵还多次盘问其高级人员在华北的活动情况, 并加以监视。在此情况下, 英美官方过度介入, 会给日军进一步打击“救世军”口实, 因此如何巧妙表达政府对“救世军”在华行动的支持态度, 需要美国政府认真思考。美国政府的理由是, 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为一国政府的天然责任。基于对国际局势考虑, 日本只能接受美国的强硬立场。但是如何尽可能支持“救世军”, 而又不过分激怒日方, 英美政府一直采取折中方案。例如 1940 年, 当日本宪兵约谈华北“救世军”领袖, 并搜查相关机构时, 英国总领事态度暧昧, 对日方“不愿有所表示”<sup>⑬</sup>。对此, 《申报》指出原因是“此事或将听候伦敦决定”<sup>⑭</sup>。

此外, 虽然英美官方并没有直接参加“救世军”救济活动, 但对英美各界人士行为, 则持开放态度。抗战期间“救世军”募捐活动中, 可以看到英美

⑦ 《国际会常委视察各收容所》, 《申报》(上海版)1937 年 12 月 9 日, 第 5 版。

⑧ 《中教道义会每晚施粥》, 《申报》(上海版)1940 年 1 月 26 日, 第 10 版。

⑨ 《工商局规定本年度补助费》, 《申报》(上海版)1941 年 4 月 3 日, 第 8 版。

⑩ 《租界罪案激增》, 《申报》(上海版)1939 年 11 月 27 日, 第 8 版。

⑪ 《救世军职员被杀, 美向敌抗议》, 《申报》(汉口版)1938 年 5 月 22 日, 第 2 版。

⑫ 《救世军人员七名在日被捕》, 《申报》(上海版)1940 年 8 月 7 日, 第 3 版。

⑬ 《平津日宪兵盘询救世军领袖》, 《申报》(上海版)1940 年 8 月 2 日, 第 4 版。

⑭ 《平津日宪兵盘询救世军领袖》, 《申报》(上海版)1940 年 8 月 2 日, 第 4 版。

各界人士的身影。1940年1月,“救世军”举办汽车施粥活动,一位六岁的英国儿童“闻贫民倒毙街头之讯,深为感动”,第二天清晨携其母“捐赠衣服鞋袜多件”<sup>⑤</sup>,一位英国商人捐款千元予以协助。比英籍商人和儿童更为引人关注的是,部分具有官方色彩的英美籍人士参与“救世军”的活动。美国亚洲舰队司令雅纳夫妇,在“救世军”1939年举办的年度募捐中“捐巨款”<sup>⑥</sup>,借以表示支持。作为非政府性质的慈善组织,募捐活动能够得到英美官方人士的支持,在战时状态的特殊时局下引人注目。

### 3.2 英美官方对于“救世军”态度的两面性

如前文所述,英美官方对待“救世军”救济活动处理方案具有明显的两面性。英美政府之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日军对“救世军”的救济活动早已深感不满,只是碍于其非政府组织性质,不便公开干预,而一旦英美官方介入,不仅会使“救世军”非政府组织的性质改变,给日方以干涉口实,也会引起英美政府与日本直接冲突,这与英美的国家利益并不相符。另一方面,由于德日两国的结盟意图日益明显,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英美政府逐渐意识到需要通过一些必要手段支援中国抗战,而其对“救世军”提供间接协助与支持,正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基于“救世军”所具有的基督教色彩及在英美等国社会的广泛影响,特别是救济在华的英美侨民,使其母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手段,提供支持和协助。事实上“救世军”通过英美官方的间接支持,收到了一定的急需物资和善款。

应当指出,英美官方对于“救世军”在华救济活动的折中态度是当时国际形势与基督教在英美社会巨大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完全卷入对日战争之前,英美官方一方面透过对“救世军”在华救济活

动的协助,不仅对中国坚持抗战的支持,而且也向本国民众传递不会轻易向法西斯势力低头的态度。当然,官方不直接介入的立场,虽能避免给日军以口实,但对“救世军”的活动则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 4 结 语

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世军”在上海、广州、香港等沦陷区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难民救济和善款募集活动,受到社会舆论的赞誉。“救世军”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就,离不开各界人士,特别是租界当局及英美官方的支持和协助。正如“救世军”在沪总指挥马瑞山在调离中国之前的告别演说中所指出的那样:“救世军自成立以来七十年中,其努力之社会工作,曾未有沪战发生后处置难民问题之艰巨者,战后各处迁避来沪之难民不下六万八千人,赖各团体之苦心经营,始将此一问题解决。”<sup>⑦</sup>

值得注意的是,“救世军”在华开展的战时难民救济活动中,国民政府几乎处于完全缺位的状态,代表外国在华势力的租界当局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正常现象。虽然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大片领土相继沦陷,国民政府无法对“救世军”的救济活动进行相应的规划和管理,只能依靠施肇基等官方色彩人士参与募捐来证明其存在,这种近乎完全缺位的做法,实际上表现了其对沦陷区影响力的脆弱性,更表明其在沦陷区无法有效的开展民众动员。

纵观“救世军”抗战期间在华开展的战时救济活动,可以看出其中各方势力角逐的影子,“救世军”在各方的博弈中,积极致力于各种战时难民救济活动,并利用其非政府组织的性质,游走于各方势力中间,尽一切可能为其救济活动提供便利,为抗战时期在华难民的救济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sup>⑤</sup> 《救世军汽车施饭》,《申报》(上海版)1940年1月27日,第10版。

<sup>⑥</sup> 《救世军救难募捐已超过三万八千余元》,《申报》(上海版)1939年2月22日,第11版。

<sup>⑦</sup> 《救世军领袖马瑞山定期离沪》,《申报》(上海版)1941年4月4日,第10版。